

药价扭曲幕后推手调查



所趋。正在制定的《药品价格管理办法》和国家发改委在最近透露出各种信息,也都呼应着这种趋势。

外资特权药不但有高价,也占据着全国接近30%的市场,在一线城市的二三级医院占比更是接近70%,在诸如心血管治疗药等医院常用药中,外资药占比遥遥领先。

在这样的现实基础上,取消外资特权药的努力会出现怎样的不确定性?国内医药市场又会出现怎样的格局?

特权药争议已逾十年 发改委态度趋明

2010年广受关注的一份“国家基本药物外原研药单独定价与国产药品统一价对照表”中,9个外原研药价格平均比国产药品高出13倍,最高达23倍,价格最接近的也高出6倍多。

上海罗氏的头孢曲松(商品名“罗氏芬”),曾被业内讥为国家价格主管部门的“罗氏芬难题”。同种药品,甚至有些同为基本药物,为什么外原研药和国产药价格如此悬殊?

“最主要原因在于‘原研药’的特权。”中国医药工业科技开发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对记者说。

何为“原研药”?官方解释是“化合物专利过期(包括行政保护期结束)的专利药品和同类药品(未能申请中国专利保护,但在国内首次上市的药品)”。

我国市场上,“原研药”药品主要集中在外商独资、中外合资制药企业中,“原研药”在招标、政策性调价时的特权待遇,是国内制药企业抱怨十余年的焦点所在。

为鼓励企业进行药品研发,鼓励外企将更多创新药带入中国市场,2000年左右,原国家计委制定的政策给予创新药品定价优惠,使原研药价格逐步脱离一般药品的价格体系。对于已过专利保护期的原研药品的价格,原国家计委是在仿制药成本基础上上浮30%~35%制定出来的。

然而,这一加价比例引起外资药企的反对,他们认为,以国内仿制药企业的成本作为定价基数不足以反映他们在中国建厂、药品注册、医生教育、上市后药品监督等方面的真实成本,因此“原研药应该依照国际惯例定价”。

全国人大代表、扬子江制药集团董事长徐镜人痛陈:“在招标时把人家的仿制药卖高十几倍、几十倍的价格。同样是仿制药,价格却不一样,我们总好像比别人低一等似的,感觉很自卑。”

而今,国家发改委也开始直面争议,态度渐趋明确。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医药价格处处长宋大才

对记者说:“逐步缩小单独定价与统一价之间的价差,大幅降低过了专利期的原研药价格是我们政策制定的方向。这些单独定价药品都得到了合理补偿。所以说,这些企业还是能够满足生产、研发投入的。”

但另一位知情人士则对记者说:“对于这个问题,即便国家发改委内部也仍然存在着争议。”

拒绝降价的软硬两手

大部分在华外资药企重要利润源就是拥有单独定价权的原研药。一些机构预计,外资企业原研药销售额占其总销售额80%以上。

可以预见,取消或降低外原研药单独定价注不会是件容易的事情,或许会面临软、硬两方面的阻力。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研制与开发行业委员会(英文简称RDPAC)在回复记者的邮件中说:“我们已经向政府提交了一些统计数据——通过对亚太地区内和几个国际市场的比较,证明在中国的出厂价是合理的。”

2011年1月10日,RDPAC也曾发布报告说,“中国‘十一五’规划期间,RDPAC的37家会员公司在华投资总额超过200亿人民币,其中近1/3用于研发中心建设——有15家企业在中国设立了19个研发中心;70%以上的会员公司在中国设立了生产工厂,工厂数量达到49家”。

他们善于将诉求的“合理性”传达给政策制定者。比如,2005年10月底至11月初,RDPAC等机构组织了一次为期两周的欧洲之行——“中国制药知识产权欧洲考察”,考察团成员是多个主管部门共计12位官员和制药行业代表。在后来撰写的报告中说“考察报告中的一个主要建议是在中国制定延长专利保护证书的体系”。

有时,外资制药企业也会直接提要求。比如2004年6月,欧美制药企业通过协会向中国政府提出单独定价的要求。事情由头是我国价格主管部门在2004年及以前的多批次降价引起诺华、罗氏、惠氏、默沙东、德国先灵等几十家外资药企的不满。

外资特权药仍会存在且强势

2010年10月25日,RDPAC发布《制药企业质量体系调研项目》报告。该报告由RDPAC和美国制药研究和制造商协会(PfRMA)联合委托机构对中国制药企业质量体系进行系统评估,项目组对13家领先的中国制药企业和大量

行业利益相关者进行了抽检、调研。“研究发现,同样是GMP认证合格的企业,由于质量管理体系不同,药品质量可能存在较大差别。”

报告还揭示一个问题,“中国医药产业大而不强——5000多家制药企业尚无一进入世界制药50强,即便是从仿制药的角度而言,中国企业距离Teva(印度企业),山德士(瑞士诺华旗下公司)等仿制药巨头也有不小的差距”。外资制药企业像导师一样为中国制药业指出了完成从“大”到“强”的光明之路——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质量管理体系。

国家发改委也认同缩小价差的主张,但是对于似乎“忧心忡忡”的外资药企也不忘给予一些安抚。

宋大才对记者表示:“缩小价差始终是我们坚持的方向,但是这需要一个分步到位的过程。”

问题的关键是“过渡期已经很多年,还将延长多长时间”?业内知情人士曾透露,国家发改委的设想,外原研药与国产仿制药之间的价差将在未来4年内逐步拉平。但是,对于这一说法目前官方回应相对模糊——“分期分批阶段执行”。

“系铃”容易“解铃”难 谈判近乎无筹码

设定过渡期的做法,也取得业内一定程度理解。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综合部主任、中国医药产业安全调查课题组牵头人许铭对记者表示:“一步到位取消外原研药特权待遇不现实,国内企业要适应即将到来的高中低端市场全面竞争也需要过渡期。”

近些年以来,外资药不仅占据价格高地,也

占据着中高端市场,而国产药品则主要把控着没有多少价格主动权的中低端药品市场,从而大致形成一种“平衡”。

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似乎谁都输不起。对于国内企业来说,输就意味着在本土市场全线溃败,彻底抬不起头。财大气粗的外资药企也输不起。因为除了专利药将持续到期,后续创新药物乏善可陈之外,他们还面临一个残酷的现实——欧美传统医药发达市场增长明显趋缓,但包括中国在内的17个医药新兴市场则表现出显著成长潜力和市场前景,而这能够在股市上为股东设定一个期待。

IMS的研究认为,中国医药市场在2010年~2014年复合年增长率将达23.2%,同期全球医药市场复合年增长率下降到6.2%,全球超过45%的销售增长贡献来自新兴市场医药市场。

“强基层”是此轮新医改的重点举措之一,基层药品市场将大幅扩容。有预测说,未来几年中国医药市场1/3的销售将来自于三四线城市。

记者注意到,在新医改之初,外资药企对基本药物目录多少显得漠不关心,后来渐渐变得重视起来。外资药企已经着手开辟“潜力巨大”的基层市场,甚至表现出欲薄利多销“以量补价”的姿态,试图主动打破与国内制药企业形成的市场“平衡”。

许铭对记者说:“新医改之后,外资企业似乎比内资企业对新医改政策更加敏感更加关注,市场布局目的性更明确。”

如果外资药企放下身段,国内制药企业,究竟有多少胜算呢?这是未来几年足以让人紧张的问题。因此,很多专家对于国家层面上推进的重大新药创制专项寄予厚望。

据《瞭望东方周刊》

谁在扭曲药价

“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天价药”屡屡被曝光,令人纠结。

作为医疗问题矛盾的集中体现,理顺药价是医改所当然的重点。近来,在抨击“药价虚高”多年之后,“药价虚低”的说法又开始流行,医药界已然呈现“药价虚高和虚低同时存在”的扭曲之局。

记者调查发现,生产企业、流通企业、医疗机构都对药价问题倍感委屈,甚至,仅仅批判“以药养医”体制都是不够的——客观存在的监管“缝隙”和监管不力,使得一些企业有多种回旋空间,“变脸药”不停地出现,最终影响到价格。另一方面,“特权药”已成医药界顽疾——20多批次的药品政策性降价,对享受超国民待遇、拥有单独定价权的外资药影响甚微。

“特权药”强势之局

近年来,中国20多批次的药品政策性降价,对拥有单独定价权的外资药影响甚微,“特权药”已成医药行业顽疾之一。

3月28日开始实施的新一批药品降价重点列入了外资药品,被认为是继2010年12月降价之后,主管部门第二次对外资特权药动刀。

此番,外资制药企业不再直接拒绝降价,而是呼吁“合理评估价差,分步骤、平缓的价格调整。避免市场过大震动,影响企业投资的信心”。

这样的表态基于一种政策动向:取消外资药品定价特权,缩小与国产药品的价差是大势



新闻时评

社会文明 不能依靠“断喝”前行

无论是个人断喝,行政处罚甚至司法解决,“禁止”或者“处罚”,都只是负面的手段,而最终的目的,仍在于公共秩序的维护、社会文明的前行。只有把倡导行为和禁止行为,都内化为文明习惯,在潜移默化中形成风尚,才有可能促成社会的进步。

网络热传“地铁表情图”,或悲或喜或茫然的表情符号,让人莞尔,也让每个亲历过地铁高峰者感同身受。不过,如果在这些密集的表情中,加入一个照相机的图标,会如何?近日,有北京市民乘坐地铁拍照留念,被站务人员制止。地铁公司答复称:地铁站内不允许拍照录像。

这样的禁令,有合理之处。724.5万人次,这是“五一”期间北京地铁刷新的日客运量新纪录。相对如此密集的人流,地铁站的空间确实显得狭小。这种情况下,还人人都要以飞驰而来的列车标注“文艺腔”的深刻,以汹涌澎湃的人潮凸显“小清新”的忧伤,那不惟可能让自己“深刻受伤”,更可能造成秩序混乱,引发事故。

禁止在地铁这样的特殊空间拍照录像,也是一个“国际惯例”。比如,香港《地下铁路附例》明确规定不得“使用任何录音或录影或拍摄器材”,美国纽约禁止在地铁和公共汽车上拍照,日本东京地铁里甚至禁止使用手机通话。北京地铁公司的答复——个人行为和有危害的行为“无法甄别”,长时间停留容易造成拥堵引发安全事故,也透露出共同的“应然”取向。

但是,禁止拍照的理由再充分,也需要有法规的支持。对于个人,“法无禁止即许可”,而现在,尚没有具体规章禁止在地铁中拍照。而且,作为提供公众服务的机构,如果不允许拍照,也应该以公示的形式告知。

说到底,对于拍照行为,或其他对公共秩序有潜在威胁的行为,不能只靠站务人员的“断喝”。这一方面使得公共场合的管理维系于个人的责任心和能力,难免出现缺失和疏漏;另一方面也让被制止者产生心理抵触,既容易引发矛盾,更不利于文明习惯的涵养。

禁止在地铁中拍照,只是一件“小事”。但这件事,却可以从两个方面照见社会文明进程中的普遍性问题。

一方面,对于社会管理者,则需要从小事和细节入手,增强社会管理的能力和效率。无论是个人断喝、行政处罚甚至司法解决,“禁止”或者“处罚”,都属于事后惩戒手段,而最终的目的,仍在于公共秩序的保护、社会文明的前行。只有把倡导行为和禁止行为,都内化为文明习惯,在潜移默化中形成风尚,才有可能促成社会的进步。

梅子

对职业的期望折射公众价值观

10日,广东省科协发布2010年广东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报告。调查显示,广东人最希望子女从事的职业为企业家和官员,下面依次为:医生、教师、科学家、法官、工程师、运动员、记者、律师、艺术家。(5月11日《广州日报》)

每个人的职业期望在未实现之前,都具有私密特征。就是说,它属于个性,有特定的倾向性,是人的价值观的折射。家长对于子女的职业期望,反映的是他们对职业特性的评价和对职业价值本身的取舍。

做家长的,没有哪

个不希望自家孩子将来有出息,生活得好。望子成龙、盼女出人头地的文化心理,几乎内化于每个家长身上。在所有的社会里,有一个问题是肯定的,就是理想事物是稀缺的,同时,人们亦缺乏公平地获得社会所提供的理想事物的机会。在崇尚个人成就的社会里,个人成就才是在所有价值观念中被评价最高的价值。理想地说,人们崇尚那些才艺出众者,尤其是那些通过艰苦劳动而取得成就的人。因而,在那样的社会里,

公众对于子女的职业期望,才会有特异的色彩。他们更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有理想的人、成为出色的科学家、艺术家,或者是法官、律师。只有在人为地将人分为三六九等的等级社会中,才会有最想让子女为企业家和官员的渴求。在社会学的解释里,所有社会都有社会分层体制,即一种根据财富、权力和声望的分配所决定的人们社会地位的排列模式。财富和权力,在部分本土公众眼里,是最好的东西,个人要取得的个人成就,主要是指这些东西。

有钱能使鬼推磨,这是由一种价值观创造的俗语。现实语境中的鬼为钱推磨,使人更加相信鬼与钱所具有的双重力量。在价值观变异的年代,它早已化为了更多的人所实践的人生哲学。太多的鬼为钱推磨,使看客世界又增多了丧失基本价值场域的看客。不用说,权力在有些人眼里、手里,是个更好的东西。权生钱,钱生权,是一次次的循环流程,还是司空见惯的现实交易的场景。今语

人均38.67万薪酬像一把尖锥

针对5月9日《京华时报》报道中海油员工人均薪酬38.67万一事,11日,中海油总公司方面称,员工人均收入的确高于石油石化行业平均水平,员工月薪38.67万元,是包括员工拿到手的工资在内的,还包括教育培训费、工会经费、各项社会保险等费用在内的全额人工成本。(据5月12日《京华时报》)

无论是员工到手工资,还是企业角度的全额人工成本,人均38.67万元,绝对算是高工资。在大多数数薪阶层还在为着个税起征点3000元是否合理而争执不下,一部分低收入、无收入人群还在靠着国家每月几百甚至几十元低保补贴生活的大环境下,38.67万元,无异于天文数字。

垄断行业因为其得天独厚优势,拥有更多发展和创收的便利。有了利润之后,发起工资来难免“大手大脚”。在给潜在的股东即全体民众分红之前,先让内部人员“多拿点”,似乎又成为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其实,比起“天价酒”、挪用公款发补贴等行为,中海油还算

“规矩”得多。

一些农村低保户,每月的低保金还不足百元,这和垄断企业的天价薪酬简直没法比。贫富差距何如对资源占用的不均。一些垄断行业占有大量资源,创造着巨额的财富。普通民众,名义上是资源的主人,实际却没有资源分配权,甚至没有受益权,贫富分化自然会加剧。

以笔者之见,加大收入分配改革,促进社会公平,一要严格控制垄断企业、国企高管等特定人群的高收入;二要规范化财产性收入、资源性收入,充分利用税收的杠杆作用,对企业特别是垄断企业进行税收征缴,红利征缴;三要以直补等方式,促进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增长;四要完善各项社会保障体系,在养老、医疗、教育等民生方面多投入,减轻普通民众生活压力。只有让每一个人都能更加幸福有尊严地活着,人均38.67万才不至于像一把尖锥,刺痛人的心。杨荷

“故宫建福宫风波”伤的是社会诚信

近日,故宫否认建福宫成为顶级富豪私人会所。但一名知情人爆料称,他与百余名长江商学院CEO班学员均收到一份徽标为紫禁城建福宫的《入会协议书》。他透露,故宫下属的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公司表示成为会员可享受在建福宫宴请、开会等服务。会员需按期交付年费。(《新安晚报》A12版)

为了掩饰一个谎言,就可能需要一千个谎言。面对知情人的爆料,刚刚还信誓旦旦一口否认的故宫,不知又将做出何种回应?

从故宫被盗的“笑话”到“错字”风波,再到建福宫成为顶级富豪私人会所所传的一波三折,如此被认真地“烘烤”,其头顶上的华丽光环,只是更无限膨胀着

公众的重重疑虑。

首先,当故宫建福宫与私人会所之间的亲密关系渐渐变得清晰时,我们不禁要问,到底还有多少稀缺珍贵的公共资源正在沦为少数人的特权?这是一个问题,而类似的问题和现象恐怕不仅仅只发生在故宫的头上。比如曾有报道称,杭州西湖的诸多名胜古迹早已变身少数人进入的“乐园”。

再说,建福宫变身私人会所是一回事,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撒谎是另一回事,而后者更加令人难以接受。不知道遮遮掩掩是否是一种习惯,但在信息高度发达的当今,一味地回避显然不是良策,更多的事实只会将撒谎者一步步逼入墙角,直到被纸上的火苗烧出,真正令人担心的是,当自欺欺人的否认一次次上演,



我们能否在这样一起风波与争议之中,充分理清背后的伦理道德问题,比如稀缺公共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反思社会诚信与道德血液的浓度、政府公信力等,并探索第三方调查处理以及问责机制,给公众一个交代。

故宫建福宫风波,终究会过去,问题在于,新魁/文乃玲/图

闪电“提退”是对干部任用的亵渎

近日,一则网帖称,在一天(4月18日)时间里,青海海西州政府将朱的游戏,最关键的是有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相关部门则因顺水人情,赢得了人性化的“口碑”。特别是,“提退”不影响该单位的权力分配,不占职位名额,即便提退者可以多领退休金,也是拿国家的钱,何乐而不为?

然而,“提退”让我们看到了相关人员把提退、退休当作了小孩过家家的游戏,干部提拔任用等相关用人制度遭到了亵渎,某些地方政府部门的公信力也在流失。同时,也让纳税人承受本不该承受的额外负担。

这种涉嫌滥用公共资源和挑战相关制度的行为,令人不安和焦虑。对提退事件,相关部门还需关注,可以在退休后享受高一个级别的退休待遇,坊间送其绰号“提退”。闪电提退背后,是相关人员心照不宣,达成默契,具有“一举多得”之效,官德虽然没得过,但临退

休者拥有了一定的名分和较为光鲜的面子,最关键的是有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相关部门则因顺水人情,赢得了人性化的“口碑”。特别是,“提退”不影响该单位的权力分配,不占职位名额,即便提退者可以多领退休金,也是拿国家的钱,何乐而不为?

然而,“提退”让我们看到了相关人员把提退、退休当作了小孩过家家的游戏,干部提拔任用等相关用人制度遭到了亵渎,某些地方政府部门的公信力也在流失。同时,也让纳税人承受本不该承受的额外负担。

这种涉嫌滥用公共资源和挑战相关制度的行为,令人不安和焦虑。对提退事件,相关部门还需关注,可以在退休后享受高一个级别的退休待遇,坊间送其绰号“提退”。闪电提退背后,是相关人员心照不宣,达成默契,具有“一举多得”之效,官德虽然没得过,但临退